

Observer | 上证观察家

# 把培育建设基础市场放在优先位置



郑韶

去年底,笔者在上海证券报上撰文呼吁: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基础远未夯实,务请各方将“重心下移”,以事关人民财产收入增长的中小企业及其尚未得到满足的资本、资金需求为本,积极统筹建设地方性、区域性资本市场,以拓宽、增厚资本市场的基础、深度和强度,为构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厦奠定坚实基础。

近日国内三大重要经济都市的相关进展让人看到了希望:在天津,以一定区域内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为交易标的天津股权交易所正式开张了;在深圳,已初步形成由项目、资金、股权交易市场及中介机构组成的创业投资市场体系,并正加紧设立30亿元规模的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和私募基金产业园,力争把深圳打造成为全国创业投资中心或称“风险投资之都”;在上海,年中市政府工作报告罕见地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列为当下最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之一,拟采取包括建立OTC市场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给予实质性支持。

三地的行动不仅切合中央重视中小企业的政策导向,更是在经济领域,资本市场领域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有效行动。应当给予积极评价。

三地支持、服务中小企业发展,就是支持人民增加收入,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丰裕的物质基础。在中小企业经

我们“有幸”没让华尔街的投行精英们插手尚处于初期探索中的中国金融衍生品领域,在国内活动的华尔街粉丝们也没有来得及说动、推动中国政府加速搭建衍生品及其市场的空中楼阁。没有基础性低层市场的培育建设,市场结构优化和多层化市场体系建设的进展是根本谈不上的。

去年年底,笔者在上海证券报上撰文呼吁: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基础远未夯实,务请各方将“重心下移”,以事关人民财产收入增长的中小企业及其尚未得到满足的资本、资金需求为本,积极统筹建设地方性、区域性资本市场,以拓宽、增厚资本市场的基础、深度和强度,为构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厦奠定坚实基础。

近日国内三大重要经济都市的相关进展让人看到了希望:在天津,以一定区域内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为交易标的天津股权交易所正式开张了;在深圳,已初步形成由项目、资金、股权交易市场及中介机构组成的创业投资市场体系,并正加紧设立30亿元规模的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和私募基金产业园,力争把深圳打造成为全国创业投资中心或称“风险投资之都”;在上海,年中市政府工作报告罕见地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列为当下最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之一,拟采取包括建立OTC市场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给予实质性支持。

三地的行动不仅切合中央重视中小企业的政策导向,更是在经济领域,资本市场领域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有效行动。应当给予积极评价。

三地支持、服务中小企业发展,就是支持人民增加收入,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丰裕的物质基础。在中小企业经

营发展面临严重困难的当下,三地政府的上述行动更如雪中送炭。而资本市场的科学发展,应以价值规律、市场规则为本,遵循企业由小而强而大、市场由低而小逐步向高而大渐次发展进而构成多层次有机联动的市场体系的路径。

笔者以为如此才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精神。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拥有宏观调控之责与权,在必要时可做些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之举。但归根到底,应让市场依市场规律为本自主运行。政府只在市场运行失灵时出手适当、正当干预,才不至于坏了市场又拖累政府自身。

那么,政府在资本市场发展中采取何种思路、战略为好?这就是一个见仁见智或是解答可见高下的问题了。前已肯定,三地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并构建股权市场予以实质支持的作为是受人欢迎的。但是,所作所为的目的性和在各自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却有大不同。这是笔者前文之所以忧虑而发声的动因所在。不幸,当时之所忧,在八九个月之后,竟有若干应验而令人气愤。

当时笔者提出市场发展时弊有三:

其一,政府资源向主板市场过度集中而不及其余,客观上导致内外市场资本过度聚集,快速推高了主板的股价、股指、市盈率,急剧放大了市场风险和泡沫化程度,令人普遍不安——不安的结果是泡沫破碎,市场由疯牛变狗熊。政府与投资者都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当然,这种主扳一板独大的畸形结构非由地方所造成。但地方错把国家设施认作自家光彩而不尽市场创新之责,去共同完善市场体系,分散结构风险,则不能不说一点可以之处也没有。

其二,向上向高端发展构想脱离市场现实基础。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层次单薄、品种稀少,根本没有新金融产品“衍生”的市场基础和供需规模,有人却性急地谋求建金融衍生品市场或交易所。这一次应当说“有幸”,我们没有让华尔街的投行精英们插手尚处于初期探索中的中国衍生品领域,在国内活动的华尔街粉丝们也没有来得及说动、推动中国政府加速搭建衍生品及其市场的空中楼阁。记得年初中央有一高官调研金融创新,有地方官献议发展衍生品及其市场,不料遭高官一声断喝:“找死!”眼看华尔街满地黄金甲如今竟变垃圾遍地,真应当让雷曼兄弟早一点听到这位中国高官的训诫才好,如今悔已晚矣!但是,对中国的投行粉丝,以及心有所动的金融大小主管,应当让雷曼们引以为教训,应当让无端“衍生”会“找死”之声在心中警钟长鸣!

其三,市场建设重大轻小、速高轻低。主管部门如此想,地方也有作如此想者。即使有建设基层市场言行者,或醉翁之意不在酒;基层聊作点缀,重点仍在高端;或诚心建基层,却空想做全国统一大市场。

以上种种怪现象,究其根源,都同“市长”与“市场”各自作用及相互关系的认识和对策失当有关。而“市长”派对于“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解读,显然是更多地偏向了主观调控的一端而轻视了“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性。问题是,“市长”以我为主造市是要付出事前、事中的投入代价的,例如各地正在采取的为发展金融而向金融人才(非同贵族)奉献优惠的政策,其代价不仅是物质性的公费减收增支,而且也有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社会负效应。至于事后的代价,当于国内外活例多多,不胜枚举。进一步的问题是,政策资源是有限的,政策是要讲重点的——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名言。政策将公共资源偏向了一端甚至是危险的一端,则他端就在事实上被减损或剥夺了应得的份额,而一旦市场有病,则全民都要陪绑吃药。这显然不公平,全然背离科学发展观。因此,不把基础性低层市场的培育建设放在现阶段优先重要位置上的思路,阻碍了市场结构优化和多层化市场体系建设的进展,应当对现行基础市场的薄弱、主板市场的畸形坐大和风险累积与爆发承担责任,该端去修正。简而言之,笔者还得重复一句去年的老话:

基础远未夯实,务请“重心下移”。

(作者系上海政协委员,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

# 布什救市的现实困境与对中国的冲击

◎ 陆志明

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谢尔比9月22日晚要求布什政府终止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这对原本料想本周五会通过此项议案的财长保尔森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经济周期性规律决定了逆势干预的收效往往低于预期。目前金融市场动荡主要是起因于前期房地产市场、及其衍生证券市场过度投机带来的泡沫破灭冲击。按照经济周期原理,经济循环必然要经历从高峰到低谷的过程,任何外部干预只能平滑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能完全熨平其波动的过程。

干预救市理论要求更为完善的救市计划。救市的本源来自于市场本身机制的缺陷,单纯的自由竞争市场因交易者的疯狂逐利而失去其内在的平衡机制,最终导致市场本身的崩溃和交易者的巨大损失。救市的目标并不是取代市场机制,而是要将交易者的行为和逐利性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即在保障市场内在平衡机制发挥功效的承受能力之内,以此维持自由市场机制的有序运作。而此次布什政府干预国会通过的救市计划除了关注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存亡之外,对于选择金融机构国有化与市场破产的标准;国有化与破产之后的金融机构如何运作与监管;最终这些机构如何重归自由竞争市场等等均语焉不详。难怪报告遭到了大多数议员的反对。

再次,委托——代理理论下的干预救市方案对于委托人(纳税人)的利益保障严重不足。如果将美国纳税人与政府分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话,那么严格来说,布什政府是代替纳税人干预金融市场,以实现纳税人降低房贷信用风险、促进就业和刺激消费的宏观经济最终目标。而布什7000亿救市计划虽然称得上是“大萧条”之后最大规模的计划,但是实质上却与罗斯福的救市计划大相径庭。当年新政的核心计划是制止工业实体经济的衰退,促进就业以拉动消费和经济增长,而布什的计划则完全倾注于拯救华尔街投行巨鳄,主要受益者是华尔街大腕而非普通纳税人。财长保尔森的提议也是建立新设机构来吸纳早已贬值过的次贷资产,以实现金融机构的脱困。

作为此次救市计划的最终出资人,纳税人恐怕难以享受到救市所带来的实质好处。华尔街大幅裁员不说,就是对于在次贷危机中受损的纳税人,其所承担的风险并未因政府拯救华尔街而降低,只不过债权人从私人机构转移为了国有组织。同样背负着在次贷泡沫中过度炒作的恶名,为何华尔街投行与其高管能通过救援计划

置身事外,而普通投资者作为救助的出资人却依然深陷其中?

实际上,此次救市计划最大破绽就在于其没有完备的应对措施。很难想象美联储与布什政府从去年的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后,一直没有提出应对次贷危机极端恶化状况出现时的应急预案。或许,伯南克与保尔森一直以金融市场波动只是短暂现象,甚至在今年4月还抛出“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的论调。在次贷危机急剧爆发之后,美联储与布什政府不得不转而求助于更为直接的政府干预措施,可长达数页救市报告充分说明了该计划的仓促性。即便国会无法在程序上阻止计划通过,其真正的救市效果也很难得到保障。

首先,救市计划未能提出完备的金融机构救助、国有化运作与监管、私有化重返市场的一整套计划,缺乏这样实际操作的构架,救市的后续进展很难得到明确界定。看来,即将离去的布什政府极可能把这一“烂摊子”丢给其继承人去处理。

此外,在金融机构国有化运作过程中并未明确如何进行有效监管的问题。如果没有适当的监督机制,那么很难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尤其是对于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高管而言,冒较大的风险进行投机以获取高回报,或者通过内幕交易将公共利益转移为私有利益融资会出现,而一旦风险暴露,则可通过政府补贴弥补。如果不能在后续的措施中不断完善对纳税人的保护措施,那些机制设计上的问题仅靠保尔森所引入的“经验人士”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正是这些经验人士将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华尔街百年老店拖入了破产的深渊。

就对中国的冲击而言,布什政府的救市计划直接拯救了处于困境的房地美、房利美,美国国际集团等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对于直接持有数千亿这些公司债券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但是也应该看到,华盛顿为危机融资的主要手段依然是传统的国债。而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TIC)报告,截至今年7月,日本持有美国国债最多,为5934亿美元,其次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5187亿美元。随着美国救市计划的扩大,美元汇率可能在转强之后再度走弱,而美元贬值之后,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不得不面临持续缩水的风险。

此外,美元汇率下跌,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原油、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将可能再次上调,届时对我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将会增大。最近以来持续扩大的PPI与CPI剪刀差可能面临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并最终给中国的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上升和最终商品价格难以上涨之间的冲突,直接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生存能力。



漫画 刘道伟

## “瓦尔德”们的假融资诈骗

因资金紧张而四处融资的中小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一部分骗子的“猎物”。北京市公安机关查处了16家从事融资诈骗犯罪活动的境外公司驻华代表处。这些境外公司驻华代表处通过与中介机构相互勾结,发布虚假融资信息等方式,骗取600余家中小企业资金达数千万元人民币。

## Column 专栏

全球对冲基金发展史就是一个激烈残酷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他们的投机登峰造极,他们的垮台也令人猝不及防。次贷危机一波一波蔓延,又将对冲基金推到了火山口。在新一场的“货币战争”前,对冲基金何去何从?

# 花开花落看全球对冲基金二十年



李俊

全球对冲基金二十年的发展史就是一个激烈残酷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期间的一幕幕悲喜剧,留给世人许多感叹,许多沉思。

上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势头以及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大变革”导致日本和北美的金融开放,全球对冲基金蓬勃发展,仅1990年到2000年的短短十年,就有3000多个对冲基金在美国与英国出现。不过同时也伴随着大量基金的倒闭。

因利率上升和行业经历了1991到1993年的调整,1994年对冲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在行业历史上首次缩水。1995年夏,布鲁斯·科文纳,传奇的货币与大宗商品投机客,解散了他的美国基金并把其管理的卡克斯顿18亿美元资产的三分之二还给了投资者。卡克斯顿成立于1983年,在其存续的绝大部分期间平均年度回报至少有30%,但1994年出现亏损,1995年艰难挣扎。在接下来的10月份,迈克尔·斯坦哈特26亿美元的合伙投资基金对冲基金也令人震惊地关闭了。斯坦哈特是华尔街历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人之一,以激进、短线风格和大手笔、冒险的出手而著称,给投资人赚了许多钱。他在1967年就开设设立运作基金,是行业内的先锋人物,超过30%的平均年度回报率使其在顶峰时期管理的资产达到44亿美元。

1997年7月,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创立者乔治·索罗斯狙击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货币,引发亚洲金融风暴,其旗下量子基金的规模和投机活动也达到顶峰,震惊世界。但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眼里,索

罗斯所引领的对冲基金是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贬值的罪魁祸首。

1998年是对冲基金业难忘的一年。那年9月,此前取得辉煌战绩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遭遇滑铁卢。这家由所罗门兄弟前交易主管约翰·梅里韦在1994年创立、拥有梦幻组合团队的基金,在一系列投资错误后面临资金和信用危机,濒临倒闭。在美联储出面组织安排下,以美林、摩根为首的十几家国际金融机构注资36亿美元购买了其90%股权,共同接管了该公司。不过,坏运气在延续。除了长期资本公司,埃佛勒斯资本的崩溃,罗伯逊的基金回报也在第四季度被一笔勾销,索罗斯旗下的一只基金则亏损了18%。数据显示,当年专注投资美国股票的对冲基金平均回报率为12.7%,远低于标普500指数28.6%的收益水平。

新千年对于对冲基金而言没什么喜庆,2000年3月,资产规模60亿美元的老虎基金宣布关闭并清算,而索罗斯的基金这一年也在投资科技股的尝试随着市场泡沫破裂而失败,首席投资官明星经理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等几位核心人物也相继离开。索罗斯宣告全盘洗手,不再从事全球金融市场投资,同时旗下的量子基金、量子新兴基金符合合并重组为量子慈善基金,采取保守和低风险的投资策略。

2002年以来,在投资需求推动下,并伴随着股票市场回升,对冲基金的资产规模呈现迅速增长。2004年12月,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创下新纪录。2005年8月,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成为非官方的对冲基金之都,这里有超过100只对冲基金,管理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占全球对冲基金

资产的约十分之一。

2006年8月,纽约最大的一家从事天然气期货交易的对冲基金——Mother Rock, 6.7月在天然气市场遭受巨额损失后宣布关闭。随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康涅狄格的Amaranth Advisors,尽管有全球引以为豪的风险管理系统,还是由于一次天然气投资失误而在一周内损失了50亿美元,使得其管理的资产缩水了一半。几天后,再次赔掉了10亿美元,Amaranth协议将其能源的资产组合出售给JP摩根和Citadel Investment Group。

在2001年到2006年的五年里,对冲基金的资产从5640亿美元增长到1.5万亿美元,数量从4500只扩张到12000只,5年增长率达到200%。2006年底,对冲基金百强所管理的资产已经从上年度的7200亿美元攀升到1万亿美元,增幅达到惊人的39%。对冲基金的扩张蔓延到全球,100强中有23家位于美国之外。

2007年上半年对冲基金平均收益率为7.77%,高于同期的标普500指数的6%,但低于MSCI的80.1%。在回报率背后,是次贷危机下的“山雨已来”。6月,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贝尔斯登资产管理公司旗下两只对冲基金因巨额亏损陷入困境,之后这两只基金宣布破产。8月底,投资银行巴克莱资本宣布出资16亿美元拯救伦敦的一家对冲基金Caim Capital。事实上,在当时饱受煎熬的对冲基金运道不止这几家。

同期,美国高盛集团于2007年8月13日称,它与部分投资者一起向该公司旗下一只

对冲基金注入了约30亿美元资金“自救”。截至2007年8月的第一周,这只名为“环球证券机遇基金”(Global Equity Opportunities Fund)的对冲基金净值损失大约15亿美元,达30%左右。该基金的资产净值在新的资金注入之前为36亿美元。保住面子是高盛此役的重点之一。参与此次注资行动的投资者包括C.V. 斯塔格公司、佩里资本公司(Perry Capital)和美国亿万富豪伊莱·布罗德。

2008年伊始,高盛美国投行前强盛的贝尔斯登十年的光辉历程毁于一旦。6月,鼎盛时期资产超过140亿美元的美国HBK投资公司旗下基金遭投资者巨额撤回资本,公司资产缩水至115亿美元;而另一家对冲基金巨头法拉资本管理旗下的离岸投资者基金当时面临14亿美元甚至更多的撤资。

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西方投机力量为了降低次贷危机造成的巨额损失,一方面引入发展中国家主权基金为其注资,为次贷损失买单;另一方面假借发展中国家需求增长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肆意炒作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在高盛申请破产保护后,欧洲一些对冲基金陷入了恐慌,因为它们无法收回抵押给高盛的资产,促使它们对交易平仓。同时,纽约和伦敦的其他对冲基金目前正努力从其他集团收回抵押品,从而造成了更多的压力。做空禁令迫使一些交易柜台停止了业务,这又唤醒了人们对对冲基金可能崩溃的担忧……

在新一场的“货币战争”前,对冲基金何去何从?

(作者系伦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特约经济学家和金融投融资顾问)

# 我们从华尔街大危机中学到了什么

◎ 朱民

华尔街的金融风暴,现在绝对是最糟糕的时候。而过去还有一段时间。市场还会波动,如果波动持续时间久,大家对市场失去信心,还会出现抛售,还有新一轮的危机。因为到现在为止,美国政府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只是止住了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恐慌心理。这个市场有三个问题,金融问题,流动问题,资本不保值。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股市还在大幅波动的原因。

美国政府对他们的机构救援是四个政策,第一是减息,第二是向市场注入2470亿美元救援资金,缓解流动性的危机。第三,不许做空。第四,支持这些企业。这些措施在不同方面,应该说有一定的作用。市场初步估计,这场金融危机波及15000亿美元资产。问题不在于美国政府出台法案以7000亿美元准备买这些资产,怎么去操作买这些资产,这是很大的问题。还有,CDS就是信用违约产品,这是公司对客户担保的衍生产品,非常复杂,在所有机构都有。怎样把这些产品和次债基础东西分清,难度很高。

从公司角度,是卖给美国政府的一揽子计划还是卖给国外,都是商业行为。不是一块钱买一块钱,要出最低的价格。即使最低价格,也无法保证一定是真实价格,涉及那么复杂的交易面,那么大规模,现在很难有一个程序和手法把它分清楚,过了十年以后,回头看这件事情,也可能是盈,可能是亏,结果很难说。

中国银行持有多种美元债券,这个项目已经做了一阵,我们看中的就是对方在产品上的实力,我们有广泛的市场和需求,这是很好的结合。其实并不存在便宜资产的概念。我们不认同抄底概念,我们是债务投资者,不是财务投资者,没有找到战略协同效应。

美国银行业务,资产这一块是比较弱的,需求增长很快,但产品有限。包括市场上类似的产品竞争,都比较简单。怎么样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是中国金融面临的问题。这给我们很好的机会来看国外的市场,国外的市场特别注重产品,银行业的复杂产品指标,非利息收入和利息收入比例,国外银行非利息收入达到50%,中国银行最高的是18%。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看我们所需要的产品,把

产品放回中国市场,满足中国市场的需要。

现在看来,美国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都会有大的波动,美元的汇率也一定会有很大波动。因为美国政府至少要发债,又得借债,又得增加市值,会使美元走软。金融市场会萎缩,投资美国的外国资金会越来越少,美元会不断地增长并下滑。当投资者在观望的时候,整个商品波动也很大。中国银行多少持有一些国外债券,中国银行和所有企业都受美国汇率影响,也受石油等价格影响。从最近至少一两年之内看,这对中国经济会有影响。

投行以前过度扩张了,现在的转变是给它两个约束,接受银行同等的监管,因为在投行的杠杆资本很少,因为高度杠杆,如果市场紧张就没有钱,这就会出问题。我国银行受到监管,至少得有10%到12%。还有,要求投行必须有自己的负债业务,有自己的资金来源,投行要有改变,但投行的功能还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产品为中心,以客户为中心,投行能够根据你的需要量体裁衣,来为你服务。

监管和市场总有矛盾,监管太严,金融没法发展。没有监管,则出大麻烦。怎样既把问题管住,又给市场一定的空间,这是艺术,不仅是科学。从这个意义来讲,美国这次案子捅得太大,今后一定会走监管的道路。这对中国来说,看别人犯错误,是最好的学习机会。现在在过度市场化的倾向,金融体系放宽,而监管不到位,使得外面的热钱乘虚而入,这个矛盾处理要讲科学,讲艺术,还要有智慧与运气。

这次我国也有银行因为美国雷曼兄弟的倒塌而遭受损失,但这不是中国的银行业集中在某一个债券上过度地投资,而是资产组合出了问题,从总体上来说不是很大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持有一些美国债券的。在危机过程中,第一件事是要保全自己,第二件事是学习,危机是最好的学习。中国银行业从这次华尔街大危机中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动态的流动性管理,市场管理,比如对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变化,外币和本币的变化,对风险管理控制系数等等,这个阶段我们就改变了很多。

(作者系中国银行副行长,本文根据央视经济频道“直击华尔街”节目中的访谈整理而成。)

# 一个专家结论与一条财经新闻

◎ 李记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在9月21日举行的“全球利益调整中的中国宏观金融风险”论坛上表示,长期来看,中国绝对不会出现物价的长期通货膨胀。同时,他表示,我国工资进入上升区间,未来工资将持续上涨。

这个结论,直白点说,太含糊而笼统,显然没有细化考虑到企业内部员工薪酬差距、行业(比如众所关注的国企和垄断企业)薪酬差距、地区收入差别。在通胀压力下并未真正缓解的当今,国人需要的不是专家们前瞻性过远的描绘,而是切切实实的薪酬调整。

与这条新闻相对应的,是同期的另一条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回落,企业利润有所下滑,不太乐观的数据加大了对员工减薪的威胁。分析沪深两市1619家上市公司2008年半年报可发现,与去年同期相比,有268家上市公司“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同比出现负增长,占上市公司的16.57%。

公众恐怕更为关注后一条新闻,因为“268家上

市公司减薪”这一残酷现实,更对应自身的切身感受。换言之,较之“未来工资将持续上涨”此等专家话语的宏观分析,公众更在意自己的腰包——他们普遍的忧虑是,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268家上市公司的减薪,是否会产生蝴蝶效应,波及自身薪酬的升降。

此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检视最近的各种薪酬调整,“好消息”实在寡淡。在随着CPI的缓和、通胀压力正一点点地落地,接近公众能够承受的阈值。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CPI与PPI同背道而驰的剪刀差表明,生产成本低居不下,在增加国内收入和促使企业发展的矛盾并未解决的情况下,奢谈薪酬上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否有舍“末”逐“本”之嫌呢?

薪酬调整,牵涉面甚广,利益博弈复杂,应该诉求于《工资增长机制》和《企业工资条例》等制度化构建的渠道,方能逐步求解。但对国内相关专家而言,利用自己的话语身份优势,积极推动制度化构建的进程,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是其责任所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家们与其前瞻性过远地得出隔靴搔痒的“未来工资将持续上涨”的结论,不如在薪酬调整的制度化构建上,多尽一份力量。